

逯耀东 著



魏晋史学的思想
与社会基础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魏晋史学的思想 与社会基础

逯耀东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逯耀东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6

ISBN 7-101-05169-3

I. 魏… II. 逯… III. 史学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K09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1950 号

-
- 书 名 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著 者 逯耀东
责任编辑 樊玉兰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23 插页 2 字数 311 千字
-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5169-3/K·2288
定 价 39.00 元
-



逯耀东 (1932-2005) 江苏丰县人。台湾大学

历史系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首届博士班，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台湾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四十余年，范围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史学史、现代史学、中国饮食文化史。擅长历史随笔、文化散文的写作，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历年所撰史学论集、散文集二十余种。

责任编辑·樊玉兰

封面设计·毛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出版说明

逯耀东先生 1932 年生于江苏丰县，后随家迁往台湾。1953 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在劳翰先生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北魏与西域的关系》，初窥魏晋南北朝史门径。1961 年考入香港新亚研究所，得亲聆钱穆、牟润孙、严耕望先生等诸史学大家的教言，由牟润孙先生指导，完成硕士论文《拓跋氏与中原士族的婚姻关系》，毕业后留任助理研究员，继续研究拓跋氏与中原文化的接触与转变，其成果后结集为《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1968 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班，得亲近沈刚伯、李宗侗、姚从吾诸先生，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为研究范围，论文由三位先生亲自指导。其间曾先后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平冈武夫研究室，再赴香港新亚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完成博士论文《魏晋史学的特色——以杂传为范围所作的分析》，获台大历史系首届文学博士学位，遂受聘任教于台大历史系、辅仁大学历史系。1977 年，受香港中文大学之聘，入新亚书院历史系任教，时牟润孙、严耕望先生甫退休，逯先生继任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及“中古史料”等课程，执教新亚十四年之久。1991 年，辞聘香江，重返台大历史系，讲授“中国大陆史学”、“传统史学序论”及“中国饮食史”等课程，直至 1998 年夏退休。

逯耀东先生的研究范围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史学史、现代史学、饮食文化史，擅长历史随笔、文化散文的写作，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历年所撰史学论集、散文集二十余种。近年，逯先生将其新旧史学论稿与文稿分别辑为《糊涂斋史学论稿》、《糊涂斋文稿》，由东大

图书公司陆续在台北出版,其中史学论稿已出版《魏晋史学及其他》、《胡适与当代史学家》、《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四种,文稿已出版《窗外有棵相思》、《出门访古早》、《那年初一》、《似是闲云》、《肚大能容——中国饮食文化散记》五种。此外,《肚大能容——中国饮食文化散记》、《寒夜客来——中国饮食文化散记之二》由北京三联书店分别于2002年、2005年出版,以其文采粲然、脍炙人口而深受大陆读者的喜爱。

《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二书是逯先生魏晋史学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代表作,广为学界所知。《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以拓跋魏进入长城建立的首都平城及孝文帝迁都后的洛阳为基点,讨论拓跋魏进入长城后近一个世纪文化变迁的历程,对两种异质文化交融所形成的“文化边际”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魏晋处于汉唐之间,是一个解构与重组的时代,儒家思想失去其原有的权威地位,经学笼罩下的学术纷纷脱离经学的羁绊而走向独立。《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着重考察这一时期史学主流之外出现的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流变,探讨这些新史学写作形式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

二书均经过作者前后三十年的不断修改和重写,见解精辟,体系自成。现经逯耀东先生生前同意、东大图书公司授权,由我局出版简体字版。编辑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核对了原书中的引文,对征引疏漏及排校错误作了适当订补和修正。遗憾的是,二书简体字版未及问世,逯耀东先生已于今年二月因病遽然逝世,他计划撰写的新版前言也未能完成。在此我们谨简述逯先生的学术历程及主要著述,供读者参考。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6年9月

序

原地踏步

终于在付梓前，我将这部书的稿子，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并且作了最后的修改，还动用了剪刀剪贴，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事。然后，才弄清楚三十年前，我做的是什么，以后的三十年，又做了些什么。最后，发现自己竟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原地踏步。原地踏步，就是没有长进的意思。

说来惭愧，这部书的稿子，是以我当年的毕业论文为底本，陆续改写或重写结集的，名为《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至于为什么选择这个范围拾荒，其中的过程与曲折，在我另一本书《魏晋史学与其他》的序《走过旧时的蹊径》，已有表叙。只是在撰写论文时，时间过于仓促，其中有许多误漏和不周延的地方。在取得尘土功名后，总想找一个机会，彻底改写一次。所以，以后不论环境如何转变，一直将稿子置于筐中，随身携带，准备随时开始工作。但一拖再延，始终没有真正开始。

虽然文章写作时过于草率，但对于文章的主旨和所提出的理念，却是我这几十年教书和研究一直坚持的。就是中国史学虽然和政治有千缕万绪的牵扯，但如果一个时期的政治权威的控制力量稍减，文化理想又超越政治权威时，史学就趋向多元化的发展，出现一个史学

繁荣与黄金的时代。魏晋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一样，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史学发展的环境。

魏晋处于两汉与隋唐之间，是一个解构与重组的时代。在解构与重组的过程中，许多的矛盾现象也随着出现。由于政权嬗递频仍，边疆民族与外来思想的渗入，结束了自上古以来，汉民族在长城之内单独活动的时期。这是一个离乱与动荡的时代，于是孔子《春秋》所提出的危机意识又重现。这种危机意识每遭逢离乱，都会一再重现的。因此，刘知几所谓古今正史二体之中，继承《春秋》意识的编年体，在这个时期复兴并流行。不过，编年体复兴流行之际，却有更多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涌现，形成魏晋史学发展的双重性格。我所探索和讨论的，就是这批新萌芽的史学写作形式。因为这批新的史学写作形式，更能突显这个时代的史学性格。

因此，我一直想认真地整理这部著作，阐释非史学主流外的另一种史学思想。但在准备着手整理时，却又旁生枝节做了另外的其他的工作，不过我心中却存着盼望和悬念。所以，每过一个时期，又开始重理旧业。所谓重理旧业，就是重新开始。几经断续的重新开始，书中的文章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一再重复某些材料或论证。不过，经过一再重复后，某些论点已言之成理，渐渐形成自我的体系。这是我所说的原地踏步，自己不长进的地方。虽然原地踏步，但踏下的脚印却深深烙在泥土里，也表示对自我的肯定。稿件整理已毕，糊涂斋外大雨滂沱，已近黄昏，清理案上的残稿，与剪贴下来的碎片断纸，举目四望，室内寂寂，架上罗列的群书默默。顺笔写下：“三十载旧欠已了，虽无锐见卓识，但其中存下许多待决的问题，只好留待来者了。”

三十年是一世，是段漫长的时间了。但一路行来，并不寂寞。因此，我必须感谢在路上携我助我的人。首先是我的三位论文导师，沈刚伯、李玄伯、姚从吾先生，虽他们已谢世二十多年了。当年台湾大学

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初创，我有幸得亲炙他们的教诲。他们传道授业的情景，历历在目。后来姚、李二先生遽归道山，我有更多机会亲近刚伯先生。往往是我们各执酒杯，他静静听我报告问题所在，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听完后总说：“很好，我没有意见。”我感谢他们对我启导，然后给一个任我驰骋，独立思考与判断的挥洒空间。尤其从刚伯先生那里习得治史的胸襟，并且还感染了他“量才适性”的处世淡泊。

后来在论文撰写期间，我去了日本京都人文研究所，挂单于平冈武夫先生的研究室，读馆藏的《三国志》明清刊本。平冈先生除了请我饮于“十二段家”外，对我多所照顾。最后又转到香港新亚研究所。新亚研究所是我旧游之地，图书馆所藏的图书，都是旧时故识，用起来非常得心应手。我的业师牟润孙先生，对我提出刘知几出于裴松之，感到非常有兴趣，可惜这个问题到现在，我只提出了几个点，没有更作线的串连。不过，在这段期间，非常感谢严耕望先生，遇到考证问题请教他，他总是不厌其详地向我解说。文章完后仍有些问题横在心中，这时钱宾四先生已迁居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有较多的时间前往请益。我向他问起《世说新语》卷帙分篇的问题，并说这种分类方法与汉魏间个人意识醒觉有密切关系。他听了频频颌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做的问题。是时正是盛夏午后，室外树影在熏风中摇曳，室内我们隔几并坐，两支燃着的香烟，在宁静的空气里袅袅上升。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得到这么多师长的眷顾。不过，最要感谢的，还是我妻李戎子。她是我最好的听众和助手。往往一有所得，我就将看法反复说给她听，她反复听我叙说，最后她说她不是学历史的，但我做的那一套，都已了解。的确，从最初抄录资料和制表都由她经手，论文完成后，她曾誊录两遍，当时经济条件很差，抄写时得垫几张复写纸，落笔必须用力，以致她的拇指受伤，至今仍弯曲不便。这些年我虽然在原地踏步，她却继续前进，临老又学习电脑，目的只有一个，就是

为我作文字的处理。最后还麻烦她架起老花眼镜，将早已束置高阁、封尘已久的古籍找出来，核校引文的材料，真是有始有终。所以，她最了解这部书写作过程所经历的辛苦。因此，我将这部书献给她。

我们核校一遍后，又把黄清连弟找来，请他再将稿子清理一次。清连弟从我游三十余年，又在史语所默默工作这么多年，从事中古社会史的研究，卓然有成。他在整理与核校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提出讨论，并且在若干地方还增加了补证的材料，的确辛苦他了。

不过，我要感谢的，还是刘振强先生，承蒙慨允我的《糊涂斋史学论稿》及《糊涂斋文稿》由东大出版，才激励我将一系列著作陆续整理结集。我也非常感谢负责“糊涂斋”系列的编辑和校对的先生和小姐们，由于他们的热心和细心，这一系列的著作才能顺利出版。

走笔至此，突然想到当年上姚从吾先生的课，我们师徒在他的研究室隔桌而坐，他穿着汗背心，挥着扇子，以浓郁乡音缓缓地讲他的治学经验，他说：“写文章，像腌菜，越陈越好。”可是腌菜得不时翻动，不像我将菜丢进坛子，就不管了，而且缺盐短酱，早已不对味了。但腌菜还是腌菜。

耀东序于台北糊涂斋

一九九九年岁末



目 录

序 原地踏步	/1
导言 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1
《隋书·经籍志·史部》形成的历程	/22
《隋书·经籍志·史部》及其《杂传类》的分析	/51
魏晋别传的时代性格	/71
魏晋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转变	/98
魏晋玄学与个人意识醒觉的关系	/107
《世说新语》与魏晋史学	/122
《世说新语》对个人形态的描叙	/137
志异小说与魏晋史学	/155
经史分途与史学评论的萌芽	/178
刘知几《史通》与魏晋史学	/195
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231

裴松之《三国志注》的自注	/253
《三国志注》引用的魏晋材料	/273
《三国志注》与汉晋间经注的转变	/288
裴松之与魏晋史学评论	/305
司马光《通鉴考异》与裴松之《三国志注》	/333



导 言

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无可否认的,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魏晋南北朝处于衰微和离乱的时代。两汉统一大帝国崩溃之后的四百年间,战乱连年相继,政权嬗递频仍,人民背井离乡,辗转流徙,边疆民族的内渗,更增添这个时代的历史冲击力。“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顾故乡而哀离,向阡陌而流涕”,正是这个离乱时代的写照。刘琨北征的《伤乱诗》,桓公过金城的攀柳泫涕,卫洗马渡江时的神形惨悴,周侯假日新亭的触景伤情,……都说出这是一个动乱的时代,这是一个转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这是一个汉民族单独活动结束的时代。任何的动乱、转变与矛盾都会激起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激荡。这种心灵深处的激荡,往往是凝成而且又是迸发历史感情的泉源。

—

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于作为两汉最高指导原则的儒家思想,发展到后来由于本身的凝结与僵化,失去最初的活力与弹性,随着汉帝国的崩溃,因而丧失原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虽然许多知识分子从各方面努力,企图挽救这座偶像的坠落,然终归徒劳。因此,他们饮酒行

乐,他们傲啸狂放,他们谈玄论难,他们向道慕仙,虽然他们所寻求的生活情趣充满美感,那些美感写在郭璞的诗里,点缀在顾恺之的画里,但其中却渗拌难以排遣的悲凉。这悲凉的境界正是他们苦闷的象征。因为旧的规范既然失去依据,而新的秩序又无法一篑而成,在社会结构解构与重组之间,原来集结在旧的规范下的个人,只有游离四散,寻求个人暂时栖寄之处,这是魏晋为这个时代的史学所提供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

一个时代的史学孕育在它所存在的时代中,并且与这个时代发生交互的影响。透过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可以了解这个时代史学的转变与特色;分析一个时代的史学的发展,同样也可以寻找这个时代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痕迹。因此每一个时代的史学,都有其自身的特质和个性。

分析魏晋史学所具有的特质,因为儒家思想衰退所形成个人意识的醒觉,是一个存在而且重要的条件。由于汉武帝选择儒家思想,作为帝国的主要的支柱,于是儒家思想便超越各家一跃变成权威。不过,任何思想一旦变成惟我独尊的权威后,就会很容易定型。既经定型的思想,往往失去原有的活力而逐渐僵化。人们对于这种行之既久的思想,只有在接受或不接受之间选择,很难再作最小幅度的调整,而且更没有批评的余地。因此一旦社会发生变动,这种既已僵化的思想体系,很难适应变动的新环境。这种情形同样也发生在两汉被视为权威的儒家思想,在西汉末年已遭遇困境,拖延到东汉末年,就不能不放弃原有的权威地位,自第一线向后撤退。于是使得原来笼罩在儒家思想之下的其他各家思想,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文学与艺术,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①。当然,作为意识形态结构重要环节的史学,也在这

^① 本书《魏晋玄学与个人意识醒觉的关系》,页107。



时渐渐开始脱离儒家的经学羁绊,由原来附骥在《汉书·艺文志·春秋类》的史书,经过四百年的演变,最后形成《隋书·经籍志》独立的《史部》,是魏晋史学转变的重要关键^①。

虽然儒家思想失去原有的权威,使得史学挣脱经学的系羁而独立。但如果没有因儒家思想丧失权威,而促成魏晋个人意识的醒觉,也不会产生魏晋史学超越两汉、睥睨隋唐的辉煌成就。惟有这样,原来在儒家道德规范约束下的个人,才能使个性和感情获得一个解放的机会,不必完全依据儒家的价值标准选择材料。于是过去许多缙绅先生难言的材料,也进入了历史解释领域,因而史料引用的范围也随着扩大。由于选择史料范围扩大,新的史学著作形式相继出现,《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十三种史学著作的分类,虽然某些在渊源上可以找到传统的依据,但大多却是魏晋时代发展而形成的。

在这些新的史学作品形式中,最足以表现魏晋史学特色的是杂传。因杂传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当时其他形式的史学著作,而且杂传的内容诚如其名,相当复杂,包括郡书、家史、类传、别传、僧道、志异等。所以杂传的“杂”字,就不能从《隋志》那种传统的解释去了解,而有《隋志·子部·杂家类》所谓“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的倾向,也就是说这种史学写作形式,已将许多非儒家正统的思想,也归纳到这种史学写作之中。这一方面说明魏晋史学渐渐脱离儒家的范围,而“通众家之意”并收兼取,形成独立的科门;另一方面分析这些史学写作形式形成的背景,就会发现它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都根植魏晋时代之中^②。

所谓思想根源,也就是在魏晋玄学思想发展的影响下所形成的率真自然人格,扬弃儒家繁琐、古板、矫揉做作的礼俗,而自由自在地寻求个人心灵上的乐趣。于是率性而行,回归到自然,使得在传统压抑下的个

① 本书《〈隋书·经籍志·史部〉形成的历程》,页22。

② 本书《〈隋书·经籍志·史部〉及其〈杂传类〉的分析》,页51。

人的个性和感情,同时获得解放,于是出现许多儒家道德规范以外的个性新类型。这种个性的新类型,给当时史学家对于人物的评论,树立了新的标准。由于这种人物评论的新标准,而开辟了魏晋以人物为主的别传写作的新境界。另一方面在杂传中有许多叙鬼怪之志异作品,这批作品在唐以后被视为小说。但是在魏晋时代却认为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进入历史记载之中。这一类的著作进入历史记载,也是由于儒家思想衰退,相对的非儒家的新价值观念出现,志异就是对这种不同观念肯定下的产物,更配合当时玄学发展过程中,儒生方士化倾向的蜕变,凝结成其特有的时代性格,而进入魏晋史书记载之中^①。

至于社会的基础,世家大族表现了魏晋社会的特色,而九品官人法最初建立的目的,有抑制世家大族的意味在内,但后来的发展却反而变成为世族服务,并成为支持大家世族门楣不坠的重要支柱。其中的“辈目”及“齐名”,不仅是魏晋的杂传丰富的资料来源,同时“辈目”及“齐名”的类比人物评论方法,对杂传中的郡书、家史、类传、别传也产生了启发作用^②。

魏晋的史学,尤其代表魏晋史学特质的杂传,是个人意识自觉下的产物。但魏晋时代个人意识的醒觉,却是以儒家思想失去原有的权威为前提的。由于旧的权威失去原有的作用,于是在传统约束下的个人,开始对过去的偶像发生怀疑,经过自我的反省后,而发现自我的存在,最后个人终于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汉晋间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特殊景象,也是魏晋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的基础,更是魏晋别传兴起的动力。

① 本书《志异小说与魏晋史学》,页155。

② 本书《魏晋别传的时代性格》,页71。